



编者按： 汪曾祺先生1997年去世以来，有大量他的作品集出版。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汪曾祺全集》出版，今年是汪曾祺诞辰100周年，又一部20卷200多万字的《汪曾祺别集》由	星汉文章、读蜜传媒联合策划编辑，即将由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 这套别集由汪曾祺先生哲嗣汪朗主编，并由其家人及深知汪曾祺的作家、学者、编辑协同编选而成，包含小说、散文、	文、剧作、诗歌、书信等。别集底本为初版本，参以手稿，经信俱备。每卷各有独立主题，汇为汪汪巨浸。 本版特刊发这套别集的总序和部分分卷的编后语，以飨读者。
---	---	--

别集，本来是汪曾祺为老师沈从文的一套书橱拟出的名字，如今用到了他的作品集上。这大概是老头儿生前没想到的。

沈先生的夫人张兆和在《沈从文别集》总序中说：“从文生前，曾有过这样愿望，想把自己的作品好好选一下，印一套袖珍本小册子。不在于如何精美漂亮，不在于如何豪华考究，只要字迹清楚，款式朴素大方，看起来舒服。本子小，便于收藏携带，尤其便于翻阅。”这番话，用来描述《汪曾祺别集》的出版宗旨，也十分合适。简单轻便，宜于阅读，是这套书想要达到的目的。当然，最好还能精致一点。

这套书既然叫别集，似乎总得找出点有“别”于“他集”的地方。想来想去，此书之“别”大约有三：

一是文字总量有点儿不上不下。这套书计划出二十本，约二百万字。比起市面上常见的汪曾祺作品选集，字数要多出不少，收录文章数量自然也多，而且小说、散文、文学评论、剧本、书信等各种体裁作品全有，可以比较全面地反映他的创作风格。若是和

汪曾祺在云南，准确点说，主要是在昆明，住了七年，一九三九到一九四六年。这七年中的大半时间，他是在西南联大的校园中度过的。

汪曾祺回忆西南联大的文字不在少数，他对联大的情感似乎是历久弥新。有趣的是，一直念着母校好处的汪曾祺，当年却因为找不出一条没有破洞的裤子，不好意思去飞机场报到当翻译，违反了当时大学毕业生必须为军队服务的规定，连毕业证书都没拿到。严格说，他只是西南联大的肄业生。

这却一点儿都没损害汪曾祺对母校的感情。

西南联大是抗战时期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联合成立的，八年间，学校的设备、条件当然无法与和平时期相比，教授、学生生活清贫困苦，却人才辈出。有人甚至认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汪曾祺的回答是：“自由。”

看汪曾祺的回忆，西南联大是一个怪人、怪事空前集中的地方。这里有绰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同学，有在敌人炸弹袭来时留守学校、只为了炖冰糖莲子的怪人，有打着无翅却拼命念一遍就算讲稿完毕的先生，有养了只大公鸡和自己同桌吃饭的哲学家……

西南联大的学风，“宽容、坦荡、率真”，简单六个字，汪曾祺推崇了一辈子。他说自己当初之所以选择西南联大，就是因为听说这三所大学特别是北大，学风相当自由，学生上课、考试都很随便，可以吊儿郎当。他就是冲着这“吊儿郎当”来的。

西南联大的自由和宽容成全了汪曾祺，他可以在上课时间随意地包茶馆，在茶馆里写作甚至完成自己的考试卷，观察各种各样的人和生话；他可以任意选择感兴趣的课程旁听，也可以独自一人“乱七八槽”地看书。

联大的老师门，教给汪曾祺的与其说是具体的知识，不如说是一种为人学的风采。汪曾祺的笔下，那些学识渊博也各有怪癖的先生，每一个都值得他孜孜来写一写。联大的老师重报告而轻考试，他们爱惜并尽可能地激发学生们的才气，他们不怕学生的“新”与“怪”，只担心平庸。尤其是汪曾祺所在的中文系，它的民主自由风，在联大诸多院系中格外浓重。

“开放”，是汪曾祺形容联大中文系精神时曾用到的一个词。他说昆明还没有这个词，但确有这个事实。在学风上，联大的“开放”促成了汪曾祺初学写作的格调，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还是造纸厂一个青工，第一次读到汪老发表在《北京文学》的小说《大淪记事》，清楚记得当时那种兴奋、发呆、木愣。这是写我们高邮的，还是离我家不远的“大脑”（我们当地人就这么写）。后来这篇小說在青工中传阅开来，阅览室有些期刊杂志的精彩处总被撕走，而这一期刊物一页未缺，大家视如珍宝。

汪曾祺是谁？怀着隐秘而长久的好奇心，我读了他很多作品，跟踪了解这位作家的生平、文学成就，更加感动于他不遗余力地用作品描摹故乡高邮，而他的旧居竟然与我家只隔几条巷子。似乎我们，是的，我们大多数人，原来对家乡很无感，读了汪曾祺的作品才会有意识反观自身，原来这个地方这么美丽，有这么多可爱的景致、事物和人，才能更理解一个远离故乡的人对故乡的极致感情，那是一种文学性的审美的爱与再创造。

如同沈从文笔下有个“凤凰”，汪曾祺有一个“高邮”。现在，高邮人都津津乐道于“高邮出了个汪曾祺”，对他作品里各有所本的人物如数家珍，知道《小娘姨》《小娘妮》写谁，清楚《侯银匠》的后人还在，被电视台采访报道过；生活中，“戴车匠”的儿子跟我一直有联系有交往，经常给我讲东门大街上的故事；《异秉》里王二的孙子曾经是我工厂里的同事，还在东门大街上卖五块钱一联的蒲包肉，人人爱吃、奉为正宗……

这些年到高邮来寻访汪曾祺故居、故人、故事的文学研究者、作家、汪迷越来越多。我最早接待

孟城驛

他能够从中西方不同的文学传统中汲取多方营养，这是汪曾祺的幸运。

汪曾祺在“自报家门”时，曾说：“我读的是中国文学系，但是大部分时间是看翻译小说。当时在联大比较时髦的是A.纪德，后来是萨特。我二十岁时开始发表作品。外国作家我受影响较大的是契诃夫，还有一个西班牙的阿索林。……我读了一些伏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读了普鲁斯特小说的片段。我的小说有一个时期明显受了意识流方法的影响。”

汪曾祺初学写作时期的作品明显受到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实验意味浓厚。其实不止是他，他的老师辈作家在西南联大开放的校园文化中，都在经历着写作生涯中的“转型”：诗人马至在《十四行集》和《伍子胥》中探讨着纯粹艺术形式和超越性的哲理命题，小说家沈从文在《看虹录》中进行着更为繁复的文体实验，诗人卞之琳转而探索散文化小说的叙事和文体。

成熟作家的转型与初学写作者的实验，都需要文化氛围、文化信息的开放，西南联大的课程设置、教师构成、学术氛围、教学理念……为他们提供了这么一个空间。

汪曾祺就是在这样的空间里，写下了相当一部分收入《鹤后集》里的小说习作，这些习作里，“西南联大”的烙印至为明显，“高邮记忆”同样若隐若现。这两大特质，构成了汪曾祺毕生创作的两块基石。

多年之后，汪曾祺成为回忆西南联大的最重要作家。这些回忆中，散文多而小说少。而少数几篇写昆明与联大的小说，气质仍然独特，不似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重写高邮时强调“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这些写云南的篇幅，依然透着一点儿古怪，一点儿漂泊时代的逸气，还有用陈郁遒姐出入的阿家林式的“静”然无事。

汪曾祺坚持认为，母校留下的最宝贵财富是“精神方面的东西，是抽象的，是一种气质，一种格调，难以确指，但是这种模糊确确实存在。如云流水，水流云在”。在昆明时西南联大，给汪曾祺的文学滋养，相对于苏北小县的古典氛围，是一种极大的提升与改造，无怪八十年代的汪曾祺要化用苏轼的诗句来表达这份感怀之情：“羁旅天南久未还，故乡无此好湖山。”

这就是汪曾祺，一个生于高邮，却是在联大的特殊气氛中“泡”出来的作家。

“改写”是汪曾祺文字生涯中一个重要的关键词。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汪曾祺先后在《北京文艺》《说说唱唱》《民间文学》杂志做编辑，来稿参差不齐，有时要亲自动手，帮搜集整理者改写民间故事，工作已经溢出编辑的职业范畴，某些篇目便也共同署名；六十年代转行到京剧团做编剧，改编戏曲剧本是职分；八十年代恢复写作以后，除了新的创作，重写或改订旧作，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部分。

汪曾祺改写《聊斋志异》的系列小说《《聊斋》新义》，最初四篇发表于《人民文学》一九八八年第三期，四篇中的后三篇是一九八七年他在美国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期间完成的。在那段时间的家信里，他多次提起这些稿子，还说“我觉得改写《聊斋》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这给中国当代创作开辟了一个天地”。至于其动因，他在后来的文字中略做过交代，如《人民文学》所刊《《聊斋》新义》的后记中说：“我想做一点试验，改写《聊斋》故事，使它具有现代意识，这是尝试的第一批。”“我这只是试验，但不是闲得无聊的消遣。本来想写一二十篇以后再拿出来，《人民文学》索稿，即以付之，为的是听听反应。”不过，直到一九九一年十月写就的《虎二题》，也仅完成十余篇。《上海文学》一九九二年第一期发表的《汪曾祺新笔记小说三篇》、《樟柳神》取材于《夜雨秋灯录》；《明白官》《牛飞》两篇，只标了“出《聊

上次提笔写爷爷，已是八年前。二〇一一年冬，《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一书再版，出版社提出，原书是从子女的视角写自己的父亲，新版可以加入孙辈的追忆，也算是回馈新读者的“彩蛋”。当时拼接到任务未及多想，开始动笔却千难万难。酝酿许久，艰难成文，之后大病一场，及至次年换了一份工作，从司法系统转到了文化管理部门，大约也是借着写文章完成了一次自我检视和自我和解。毕竟，因着一句“我是法官”被媒体口诛笔伐的老头儿已经不在，学法数载，待到自己独立落槌审案，终于确定了我似乎也不是喑法学这棵树的虫儿，还是及时并线改道，避免误人误己。

写《“名门之后”个中味》的时候，爷爷还是个不那么大众的作家，虽然已被写进了文学史，但没有太高的社会知名度，读者圈子并不算大。这些年来，老头儿越来越“有名”了，大约是作品被选入了不少地方的中小学课本的缘故，喜欢他的读者已是上至耄耋，下至稚童。今年四月，朋友告诉我老头儿的话题上了热搜，打开微博，关键词竟是“汪曾祺好爱吐槽一男的”，读者评价他的作品“自带弹幕”，说除了他，从未见过哪个作家在小说里用这么多的“（ ）”，如此积极地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于是，老头儿继“最后一个士大夫”“纯粹的文人”“人道主义者”等光环后，喜提新称号“作家里的内心帝”“图书界的 bilibili”，也算是高大上和接地气兼备了。

这应该是好事。不管读者爱的是他开放通达的胸怀、清淡隽永的文字，还是醇厚至美的乡情、食指大动的美食，总归能让更多人喜欢读读书、做做菜，让日子过得更有些滋味。但有时也觉得不安：幼时课本里的“大家”似乎大多并不受学生待见，如有篇目需要背诵更是极大拉低好感度；且老头儿的文章如果用在立意剖析、段落概括、中心思想提炼之类的题目上，约莫对出题的老师和答题的学生都是种折磨。前些时日，同事带着上小学的女儿来单位值班，小姑娘说自己特别喜欢汪曾祺爷爷的文章，学了课文之后就去书店买了好几本他的集子。我好奇地问她喜欢什么，小姑娘

之前添加这些“零碎儿”，可以让读者从多个角度了解汪曾祺其人。这种方式算不得独创，《沈从文别集》就是这么编排的，只是一般书很少这么做。也算是一别吧。

再有一点，就是编者有点儿良莠不齐。这套书的主持者，以五十岁左右的中年人居多，他们大都对汪曾祺的作品有着深入了解，也编过他的作品集。有的当年常和老头儿一起喝酒聊天，把家里存的好酒都喝得差不多了；有的是专攻现当代文学的博士；有的被评为“第一汪迷”；有的参加过《汪曾祺全集》的编辑；还有的对他的戏剧创作有专门研究……这些人能够聚在一起编《汪曾祺别集》，质量当然有保证。其中也有跟着混的，北京话叫“塔儿哄”，就是汪曾祺的孙女和外孙女。她们对老头儿的作品虽然有所了解，但是独立编书还差点儿火候。好在大事都有专家把控，她们挂个名，跟着敲敲边鼓，不至于影响《别集》的质量。

这套《汪曾祺别集》是好是坏，还要读者说了算。

“一条若隐若现的支流”

“一条若隐若现的支流”

“一条若隐若现的支流”

“一条若隐若现的支流”

“一条若隐若现的支流”

“一条若隐若现的支流”

“一条若隐若现的支流”

“一条若隐若现的支流”

“一条若隐若现的支流”

“一条若隐若现的支流”

“一条若隐若现的支流”

“一条若隐若现的支流”

“一条若隐若现的支流”